

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开拓

——“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综述

潘 洵 赵国壮 吕树杰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进一步推进抗日战争史研究,培养青年学者,2015 年 3 月 21—22 日,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西南大学、《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承办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以抗战为主题,围绕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展开了深入探讨。

一、军事与抗战 抗战初期广东战场因其规模小、时间短的特点,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张传宇的《重申抗日战争如何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开辟广东战场问题再考》一文,以广东作战为中心,追溯日军登陆广东计划几经修改并最终付诸实施的经过,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日军作战动机的嬗变过程,进而重新思考此战对于抗战全局的意义;同时从“破”与“立”之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日军在占领广州后,重建当地行政权力的工作,以期呈现广东作战的全貌。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叶铭的《军令部与战时参谋人事》一文,以军令部为核心,通过梳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徐永昌日记等史料,阐述其在建立参谋培养体系以及参谋人事管理诸方面的相关举措并评析其效果。认为军令部通过建立各级参谋培训机构,以完善参谋人才培养机制,并通过建设参谋人事制度,在战时参谋人员任用、晋升诸方面取得成效,达成统制参谋之目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张展的《抗战期间日军对华持久战战略》一文利用战史丛书、部分当事人出版的回忆录、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近来公开的日军档案等资料,探究日军对华持久战战略的内容和决策过程。该文认为日军的持久战战略是无法通过军事、政治手段征服中国之际,被动采取的战略方针;“不扩大派”和“扩大派”虽然在侵华问题的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两派围绕着对战争范围和对持久战准备的分歧展开的博弈,导致日军战略方针不断变化。

四川博物院陈默的《艰难的演进:抗战相持阶段国军的编制嬗变(1939—1944)》,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原始档案以及已出版的各类资料,并参照时人的回忆,复原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野战军、师在整理过程中其编制的嬗变过程,考察其由初期的“廿七年编制”过渡至后期“卅一年编制”的发展轨迹,从编制变化这一维度,分析了这 6 年里国军艰难的演进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国军与抗日战争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政治与抗战 有关抗战时期检察改革的研究涉及了国民政府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的检察改革方案、实验法院的设置、1945 年 12 月《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等问题,然而,检察制

度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正的关系,以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颀颀,还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吉见崇的《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检察改革(1938—1945)》一文,从检察制度的维持和废除、自诉的保留与废除,以及自诉范围的扩大与缩小等问题出发,着重分析抗战时期的检察改革中,国民政府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做出了何种选择以实现制度变革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应如何理解政策决定过程中出现的各检察改革方案。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实行的主要土地政策,减租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不过,以往的研究从地域来看多集中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从时间来看多集中于中共政权已经稳固之后,从内容上看多集中于政策本身的分析,但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来看,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中央党史研究室杨凯的《陕甘宁边区减租运动考察——以未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为中心》一文,把焦点放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未经历过土地革命的地区,分析了在这种共产革命的“初耕地”上,减租运动遇到的困难及推进过程。

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东的《名同实异——战时国共两党县长的比较研究》一文,通过比较国共两党县长的历史形态,探究战时国共两党在基层社会中的运行轨迹,指出不同的制度理念造就了县长不同的社会结构,不同的运行机制反映着不同的工作方式与作风,县长的实际施政效果也大相径庭。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的《日本阴影下的华北中央化困局:蒋介石、黄郛与1933年北平市公安局易长风潮研究》一文,利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蒋介石、黄郛的档案及日记,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的史料,重新梳理北平市公安局易长风潮的来龙去脉,进而管窥国民政府在推行华北中央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与挫折,试图呈现日本因素在影响及改变国民政府政治生态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洁的《华北沦陷区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之实态——关于通县新民会的考察》一文,利用北京市通州区档案馆所藏第一手档案史料,通过梳理通县新民会组织控制、内化控制、民意控制、乡村控制等相关活动,初步考察华北沦陷区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之实态。

三、外交与抗战 美国战时情报局是抗日战争史、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组织机构,然而对于该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抗战的关系,学界关注较少。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贾钦涵的《美国战时情报局与中国抗战(1942—1945)》一文,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 OWI 档案等文献资料,考察了该局针对中国战场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下达的宣传指令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并对其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评价。

关于“巴纳号”事件,中外学界著述颇丰。国内学者从“巴纳号”事件引起美国外交政策改变的角度,探讨了美日外交互动和美英两国围绕此事件开展的沟通与合作;而国外学界多从“巴纳号”事件所引发的美日外交关系的角度展开研究。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耿密的《1937年“巴纳号”事件再议——从检视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所作的观察》一文,将“巴纳号”事件放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华实施无差别滥炸暴行的背景下进行再解读,颇具新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傅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关总税务司地位的削弱》一文,从总税务司人选更迭的角度,关注总税务司地位及中英外交关系的变化,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在重庆重建海关总税务司署,对重建后的总税务司署的控制显著增强,外籍总税务司的地位受到明显削弱。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宁的《一战初期中国的中立与日本(1914.7—1915.1)》一文,利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资料、美国外交文件(FRUS)、日本外务省编纂资料,分析了一战初期,中国中立过程中的日本因素。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吴文浩的《北洋修约中的日本因素——以条约研究会对法权问题的讨论为中

心》一文,利用台北“国史馆”所藏《前外交部条约研究会会议录》,分析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职业外交家,在修约运动中对列强在华治外法权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指出日本因素对顾维钧等人决策的影响。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陈志刚的《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在华撤侨行动初探》一文,分析了1941年珍珠港事变前美国在华撤侨行动,认为相较于抗战初期旨在绥靖日本的撤侨行动,这次行动是美国积极应对日本挑战的明证。

四、经济与抗战 厚植抗战经济力,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总动员的最大目标。后方特产行业作为战时的主要能源行业,在经济持久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界定战争、资源、行业三者之间的关系,颇值得分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国壮的《战争、资源、行业:抗日战争与后方特产行业发展——基于川东桐油业的考察》一文,以后方特产行业——桐油业为例,分析其融资模式、技术手段、发展路径等方面在战时的演变,论述了战争、资源、行业三者之间呈现出的紧密互动关系。

鉴于陕甘宁边区较少受战事的直接影响,有条件较充分地完善救国公粮的各项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的《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详细分析了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收实施情况,肯定救国公粮征收对中共在抗战中生存、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燧明的《皖南事变前后国民政府与中共的货币斗争》一文,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及已刊资料,讨论了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围绕货币金融展开的一系列斗争。

台湾大学历史系许秀孟的《抗战时期江浙日占区的商人、移工与迁徙——以苏州的绍兴群体为例(1937—1945)》一文,通过对绍兴当地最大宗的锡箔产业外移及绍兴商人、工人全体搬迁到苏州的过程的考察,讨论了替代贸易道路的开发、新市场产销体系的形成以及衍生出来的在地社会问题。

五、文化与抗战 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思想和立场的转变问题,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抗战时期教育经费锐减,通货膨胀严重,官僚中饱私囊,政府救济学人乏术,导致知识阶层陷入贫困,加剧了他们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促使他们最终与国民政府分道扬镳。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韩成的《从歌颂抗战到批评政府——抗战时期储安平言论之转变》一文,以储安平为例进行个案考察,回应学界关于战时知识分子转向问题的讨论。

大连民族学院谭皓的《试论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一文,依据日本教育史料及保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等处的原始档案,梳理了近代日本文部省对华派遣留学生制度的开端、发展、变动及走向,指出近代日本留华学生在近代日本对华派遣留学生史及日本汉学发展史,乃至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占有独特地位。

日本山形大学人文学部吉井文美的《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外务省与文化事业》一文,以帝国议会上外务大臣的演说中涉及的文化事业为线索,探讨20世纪30年代在外交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外交政策和文化事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岳钦韬的《抗战时期新闻传播的路径与传受互动——以浙江省的抗日报纸为例》一文,对浙江省的抗日报纸做了个案分析,借此分析战时传播环境的利弊及其对传播的影响,希望在对传受互动机制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描绘抗战时期新闻传播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图景,努力再现新闻的力量。

日本一桥大学铃木航的《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战时新闻学会和地域社会》一文中,从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角度着手,分析了浙江省媒体动员,并研讨其对地域社会的反应,希冀通过该文的分析展示新闻学的课题和背景,即这不是以政治派系或对抗战的贡献为标准的媒体史,而是以抗战时期的中国媒体和地域社会的关系为主题的媒体史,以期通过这种媒体史来理解抗日战争和中国社会。

六、社会与抗战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常宝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痼疾问

题及其对抗战的影响》一文,探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针对中国区域性疟疾高发状况的应对情况,分析了其对抗战的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李玉铭的《饶家驹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与日内瓦第四公约》一文,分析了饶家驹战时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南市难民区的独特理念和高效管理模式),指出该模式为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即《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借鉴,最终将其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下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王萌的《日本对沦陷后南京的“宣抚”工作》一文,利用日军特务系统的宣抚班与外务省系统的同仁会的相关史料,通过对两者在南京“宣抚”活动的考察,揭示作为战争加害者的日本,是如何利用各种手段试图修改并抹去中国民众的创伤记忆,从而为其侵略谋求合理性的。

云南师范大学夏玉清的《南洋华侨社团与抗日战争——以“南侨总会”招募“南侨机工”为中心》一文,运用“南侨机工”的历史档案和20世纪30年代的南洋报章等资料,梳理了“南侨总会”为中国组织招募“南侨机工”以及各地社团招募机工的历史进程,探讨了国民政府与南洋社团的关系以及南洋华侨社团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段金生的《国家构建与边疆问题:20世纪40年代云南政、学界对边疆开发的认知》一文中,以云南省民政厅及以其为中心的人员所撰写的边疆开发建言为主要考察对象,并辅以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视域出发,审思了边疆问题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内在经纬与历史内涵。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矢久保典良的《抗战时期、回教团体对于回民“社会”统合的尝试——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设立和展开为中心》一文,从回民固有宗教意识层面来考察其对于回民内部统合作用的角度,针对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设立和展开进行分析,以考察“协会”干部对于回民“社会”进行统合的意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石峰波的《抗战时期华西坝五大学团契初探》一文,对抗战时期华西坝五大学团契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华西坝五大学团契对于试图真正融入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各教会而言,具备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时期,青年学者是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新领域的中坚力量,此次会议集中展示了青年学者在该方面的良好发展势头。其一,史料的运用日益多样、多元。青年学者利用其语言优势,广泛搜集国内外第一手资料。简单梳理与会论文的资料使用情况,不难发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国内各省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档案史料,日本防卫省防卫厅保存的日军侵华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史馆”典藏的民国资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资料及美国外交文件等重要的民国史研究资料均得到征引。一手的原始档案资料的发掘、多语言文字资料的使用,既反映出新时期青年学者较为扎实的资料功夫,也体现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进一步国际化倾向。其二,问题意识集中、突出。青年学者们不仅主动提出一些新问题,还关注一些“老问题”,并从中阐发一些新认知。其三,研究领域广泛、深入。在“大抗战史”的影响下,与会青年学者将讨论主题的时间上溯到一战期间,研究视角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并在诸多方面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作者潘洵,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赵国壮,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吕树杰,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郭 蕾)